

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

JINDAIDONGBEISHEHUIZHUWENTIYANJIU

焦润明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

焦润明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东北社会诸问题研究/焦润明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7

(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东北
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

ISBN 7-5004-5108-3

I. 近… II. 焦…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东北地区—近代 IV. 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8963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韩天炜

封面设计 诚信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80mm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2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凝炼方向 凝聚队伍 凝结成果

——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辽宁大学

“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丛书总序

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原辽宁大学历史系）由于其历史学科具有较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较雄厚的现实研究实力，在国家教育部“九五”、“十五”“211”工程建设过程中，皆被列为重点建设学科。在“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重点学科方向即学术立足点主要在哪里？我们怎样围绕主要学术方向设立项目、组织队伍、开展研究？等等。现在，辽宁大学国家“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项目丛书即将出版了，我们的思考也有了初步的结果。在此，特以此序述其缘由。

中国东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进程，形成了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区域单元，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独特的区域文明。其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地域辽阔。

作国祖国的边疆地区，东北地区陆地与俄罗斯、蒙古、朝鲜等国接壤，有数千里的边界线；隔海与韩国、日本相望，亦有数千里海岸线。因此，边疆问题是东北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东北地区的古代文明作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曾呈现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新乐文化、红山文化等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源头之一。

东北又是中国众多民族的兴起和发展之地。特别是自10世纪以迄近代，随着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的陆续兴起，继而挺进中原，建立了辽、金、元、清诸王朝，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自近代以来，东北地区亦成为列强争夺的重点地区，在这个阶段，既有张氏父子奉系军阀的统治与列强争夺中的自强，也有东北十四年的沦陷史，更有东北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

总之，在中国东北这块古老土地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是东北地

方性的事件，更是全国性事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研究东北问题就不仅仅是地方性的课题，也是全国性课题，甚至是世界性课题。其中，边疆与民族问题，又是其中重中之重的课题。

边疆与民族所涉猎的课题极广，从东北民族的起源，到东北疆域的形成沿革，再到东北区域文化与中华主体文化互动关系的研究，从近代东北地区的开埠到移民，再到东北城市进程，以及近代以来东北社会风俗习惯变迁的研究；从跨界民族问题、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原生语言问题，再到东北历史上地方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及汉化政策研究；以及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掠夺等等，都可以囊括其中。这些问题不单单是东北地区本身的研究课题，也是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研究课题。

辽宁大学地处东北，占据地缘优势和资料上的便利条件。因此，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许多前辈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对有关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开发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先后出版了有关东北边疆与民族的研究著作数十种，发表论文数百篇，承担研究国家及省部级项目数十项。其中，在全国产生重大学术影响的就有范文澜《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中的清史卷及《清代全史》第9卷、李燕光教授的《东北地方史》及《清代东北史》、宁梦辰教授的《东北地方史》、董守义教授主持的《辽河文化丛书》（12卷）、胡玉海教授主持的《奉系军阀全书》（6卷）等等。此外，由我院教师编校出版的《清初史料丛刊》在全国得到普遍认可，在清史研究资料工作上做了开创性工作；李林教授的《满族家谱研究》等，对满族的族源演变进行了实证性的开拓研究；孙文良教授主编的《满族大辞典》从整体上对满族族源、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进行学术的界定，奠定了满学研究的基础条件。历史文化学院还曾主办过全国第二届和第七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在东北近现代史的研究上，孙克复教授、关捷教授等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张德良教授、陈崇桥教授、周毅教授、胡玉海教授、马尚斌教授等对于奉系军阀及东北军史的研究，皆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了《明清战争史略》、《中国近代军事史》、《甲午海战史》、《甲午陆战史》、《奉系纵横》、《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外交》等著作。由上述学者进行的开拓性研究，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东北地方史研究领域的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学术基础，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

上述所列研究工作，在全国学术界皆有口碑。与上述相对应，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还组建了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在人才集聚、梯队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早在1958年就已组建了清史研究室；1978年全国史学研究规

划会议上,将辽宁大学定为全国清史研究中心、辽金史研究中心。1966年辽宁大学成立了东北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并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多次承担有关部门课题。在2002年国家适时启动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中,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其实力又获得多项课题立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关研究成果,对于史学研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参考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多年的建设,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已经形成了研究方向稳定且有特色,研究队伍整齐,年龄结构合理,研究经费相对充足,学术地位日渐提高的趋势。业已形成了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东北社会与民俗文化研究、东北政治与对外关系研究等三大方向。并形成了以任爽、张杰、焦润明、胡玉海、韩世明等17名教授、20名博士为骨干的稳定的研究队伍。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学术上的和人才上的基础。

就全国而言,学术应有分工。合则成一整体;分则各有特色。应该说,经过数十年凝练的“东北边疆与民族”研究领域,较好地体现了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地域特色和学科优势。同时,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充分考虑了与全国,特别是东北地区史学同行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我们将重点放在具有辽海地区地域特点之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早期人类文明、唐宋以来东北史(重点是唐史、辽金史、清前及满族史、奉系与张氏父子研究等)等。

在以上背景之下,在国家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中,“东北边疆与民族”被列为辽宁大学重点建设子项目。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东北边疆与民族”子项目成果丛书陆续出版了。愿它们能为中国史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愿包括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内的中国高等学校历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史学之树常青!

辽宁大学“十五”“211”“东北边疆与民族”

子项目领导小组 组长 丁海威

2004年7月7日

目 录

第一章 1910 年前后东北的鼠疫灾难	(1)
一 鼠疫流行的基本情况	(1)
二 应对鼠疫的基本措施	(10)
三 对晚清经济及涉外关系的影响	(24)
四 公共防疫意识与国家观念的增强	(30)
第二章 奉天谘议局与东北的立宪运动	(37)
一 奉天谘议局的成立	(37)
二 奉天谘议局的参政议政活动	(44)
三 奉天谘议局与地方公署的关系	(54)
四 奉天谘议局的历史贡献	(60)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奉天商会	(65)
一 奉天商会形成的社会背景	(66)
二 奉天商会组织形式的发展演变	(73)
三 奉天商会的功能作用分析	(85)
四 奉天商会的历史评价	(99)
第四章 近代辽沈地区的城市发展	(105)
一 近代辽沈地区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107)
二 近代辽沈地区城市化的主要特征	(124)
三 近代辽沈地区城市化对当代城市发展的影响	(136)
四 结论：关于当代城市问题的思考	(147)
第五章 日系银行与 20 世纪初的东北金融	(150)
一 20 世纪初日系银行在东北设立发展原因	(151)
二 20 世纪初日系银行对东北金融的控制和掠夺	(158)
三 东北日系银行：日本推行殖民政策的重要工具	(176)
第六章 日本侵华与东北经济殖民化状态	(183)
一 近代以来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渗透	(184)

二	日本侵华战争与东北经济殖民化的兴衰	(187)
三	东北经济殖民化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实现	(193)
四	“日本东北殖民有功论”批判	(203)
第七章	伪满洲国时期社会风俗之变迁	(219)
一	伪满洲国时期东北社会风俗的变迁	(221)
二	伪满洲国时期社会风俗变迁的特点	(244)
三	伪满洲国时期社会风俗变迁的原因	(247)
四	社会风俗变迁对东北地区的影响	(251)
五	结语	(254)
第八章	《盛京时报》广告与东北近代社会生活	(256)
一	《盛京时报》广告：舶来品的传播载体	(257)
二	《盛京时报》广告内容：社会生活的“洋化”	(265)
三	《盛京时报》广告反映的殖民侵略内容	(272)
四	结束语：近代东北社会生活的殖民化及其影响	(288)
参考文献		(291)
后 记		(298)

第一章 1910年前后东北的鼠疫灾难

鼠疫作为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烈性瘟疫，一直肆虐于晚清社会。关于晚清鼠疫问题的研究，学术界的探讨已经相当的深入，^①但是，从地域分布而言，仍不平衡。1910年至1911年发生的东北三省大鼠疫，蹂躏中国北方五省区（除东三省外，还有河北、山东），波及天津、北京地区，对晚清政局及社会经济生活领域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场瘟疫的研究与关注，到目前尚无系统之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专题研究，相信将有助于加深对晚清社会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 鼠疫流行的基本情况

此次流行的鼠疫类型为肺鼠疫，^②其基本体征是：发病时全身麻木寒冷，头晕，胸部疼痛，咳嗽咯血，呼吸短促，体温平均为38.5℃。发病后2~3天即死，尸体全身呈青紫色，惨不忍睹。考察此次鼠疫的类型及流行，就不能不涉及有关鼠疫疫源地、疫源物、疫死人数及鼠疫迅速流行之社会背景等问题。

1. 鼠疫流行时间及疫死人数

此次东北大鼠疫极其酷烈，导致数万人死亡，有人形容道：“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

① 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赖文、李永宸：《1894年广州鼠疫考》，《中华医学杂志》第29卷，1999年第4期；李尚玉：《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尚玉、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余新忠：《清代江南瘟疫对人口之影响初探》，《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等等。

② 当时医学界称为“肺百斯脱”、“肺百斯笃”。

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① 那么到底疫死了多少人？笔者遍查当时的报纸及档案资料，认为晚清“奉天防疫总局”编纂之《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所提供的数字较为准确，即在此次东北鼠疫灾难中，东北三省的疫死人数为 50927 人。^② 从材料的可信度上看，该报告书为三省各府厅州县防疫机关防疫报告的汇编，撰写者都是当时实际从事防疫工作的地方官员，因此该资料十分珍贵可信。奉天省长公署档案中有关于此报告书的背景资料云：“前因东三省鼠疫发生，当时布置各机关竭力严防以杜传染。迨至防事告终，检集防疫行政报告，既执行各种规则图表以及邀请各国特派医员莅奉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共相讨论并预筹以后防范办法，荟萃群谋证以事实，汇编一书名曰《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业经纂修完备，发交提学司图书印刷所承印一千部以备分送各机关，藉资参考等情各在案。兹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三日由该所印刷完竣，装订成册。”^③ 该档案还记录了东北地方政府将该报告分送各国驻奉领事馆的情况，其中讲到：“诚以疫症有关公众卫生，世界日进文明，讲求愈宜注意。当据在事人员将办过事实及一切研究情形汇编成册，每册计共三本。除分送外用特检同二册计书六本备函送请。”^④ 这则档案说明了《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的成书经过以及所述材料的可信。但经笔者考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所列人数中缺金州厅疫死人数，因奉天省金州厅，光绪三十一年（1905）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设金州民政署属关东州厅，清政府仅保留金州厅建制。因当时清政府行政权力已不达此地，故在附表中未予统计。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编《满洲附属地经营沿革

① 南海崔羨元：《为防疫事敬告同胞之业西医者》，《大公报》辛亥正月十五日。

② 此数为鼠疫中心地东北三省在此次鼠疫中疫死的总人数，不包括日本实际控制地“关东州”及其附属地，亦不包括关内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被波及之地。此次流行鼠疫其中心虽在东北，但其余波已达湖北、上海等地。据伍连德在其所著《中国之鼠疫史》（发表于《中华医学杂志》，中国医学史专号，第二十二卷第十一期，1946 年 11 月）上讲，1911 年仅在上海就有鼠疫患者“三十余例”，另外，当时东北的劳工多为山东、河北籍贫民，他们随车返乡，想必两省染疫者定会不少，山东巡抚孙宝琦于 1911 年 2 月 14 日发给军机处的奏电即称：“查明染疫州县已有十处，死亡百余人数十人不等，皆由关外小工带来。”（《山东疫势之蔓延》，《盛京时报》宣统三年正月十七日）。据《盛京时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载，山东芝罘，“本埠鼠疫渐次盛行，每日患该疫者不下三十人”。“山东鼠疫现在各处蔓延，蓬莱、黄县、淄川、德州、泰安、莱阳等处尤剧。”许多著述都称此次鼠疫共疫死“六万余人”。（参见冼维逊编著《鼠疫流行史》，第 110 页；《鼠疫预防法》，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 1952 年，第 2 页。）此外，在日本学者宇留野胜弥所著的《满洲的地方病与传染病》一书中，也称：“在 1910 年满洲有六万人患肺百斯笃死亡。”（海南书房，昭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 116 页。）

③ 《奉天省长公署档·12311 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④ 同上。

全史》(上卷)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非卖品)可知,此地亦疫毙228名(内含附属地)^①,所以笔者认为,在此次鼠疫中,东北地区实际疫死51155名(详见表1~1)。

表1~1 晚清东北三省疫势一览表

省名	地名	始疫日	终疫日	疫死人数	地名	始疫日	终疫日	疫死人数	统计
黑龙江省	臚滨府	1910/10/25	1910/12/14	522	安达厅	1911/02/10	1911/03/24	15	14812
	呼伦厅	1910/11/09	1911/11/30	20	拜泉县	1911/01/28	1911/02/25	52	
	龙江府	1910/11/08	1911/3/10	1402	余庆县	1911/01/20	1911/02/28	618	
	呼兰府	1910/12/17	1911/03/14	6067	巴彦州	1911/01/16	1911/03/11	1123	
	绥化府	1911/01/01	1911/03/21	1583	木兰县	1911/01/07	1911/03/17	243	
	海伦府	1911/01/01	1911/3/27	2059	大通县	1911/01/28	1911/02/27	92	
	兰西县	1911/01/02	1911/03/20	599	肇州厅	1911/01/28	1911/02/27	213	
	青冈县	1911/01/24	1911/02/26	143	大赉厅	1911/01/21	1911/02/12	61	
吉林省	吉林省城	1911/01/12	1911/03/27	364	双阳县	1911/01/19	1911/03/13	4609	29047
	吉林府乡	1911/01/18	1911/03/24	800	德惠县	1910/12/30	1911/03/23	274	
	长春府	1911/01/03	1911/03/26	5827	长岭县	1911/01/31	1911/03/05	147	
	宾州府	1910/12/18	1911/03/19	1215	农安县	1911/01/12	1911/03/27	437	
	新城府	1911/01/05	1911/03/24	615	长寿县	1911/02/12	1911/02/24	46	
	宁安府	1911/01/01	1911/01/14	34	磐石县	1911/01/23	1911/03/11	214	
	依兰府	1911/01/19	1911/03/23	137	额穆县	1911/01/29	1911/03/01	19	
	双城府	1911/01/02	1911/03/23	4609	敦化县	1911/01/21	1911/02/21	39	
	五常府	1911/01/31	1911/04/02	257	桦川县	1911/01/15	1911/03/17	73	
	滨江厅	1910/11/08	1911/03/11	5693	阿城县	1910/12/23	1911/03/06	1795	
	榆树厅	1911/01/01	1911/03/31	1218	舒兰县	1911/01/22	1911/03/22	261	
	伊通州	1911/01/31	1911/03/21	343	方正县	1911/01/22	1911/02/22	21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四年(1939)九月二十五日,日文版,第83页。满洲日日新闻社印刷,大正八年(1919)五月,日文版,第809页。

续表

省名	地 名	始疫日	终疫日	疫死 人数	地 名	始疫日	终疫日	疫死 人数	统 计
奉 天 （ 辽 宁 ） 省	奉天府	1911/01/02	1911/04/18	2579	绥中县	1911/01/17	1911/01/20	70	7296
	抚顺县	1911/01/22	1911/03/09	83	磐山厅	1911/02/22	1911/03/23	27	
	辽阳州	1911/02/06	1911/03/03	46	锦西厅	1911/01/29	1911/02/27	25	
	铁岭县	1911/01/10	1911/03/17	160	海龙府	1911/02/16	1911/03/13	11	
	开原县	1911/01/26	1911/03/16	220	东平县	1911/02/21	1911/02/25	4	
	辽中县	1911/02/01	1911/03/11	79	西丰县	1911/02/05	1911/03/22	83	
	本溪县	1911/01/23	1911/02/19	28	西安县	1911/02/04	1911/03/06	111	
	金州厅			228	柳河县				
	新民府	1911/01/14	1911/03/09	622	昌图府	1911/01/17	1911/03/23	619	
	镇安县	1911/01/16	1911/03/31	112	辽源州	1911/02/03	1911/03/09	26	
	彰武县	1911/02/15	1911/03/05	11	奉化县	1911/01/22	1911/03/13	360	
	锦州府	1911/01/28	1911/03/02	33	怀德县	1911/01/23	1911/03/26	673	
	广宁县	1911/01/15	1911/03/07	225	康平县	1911/01/28	1911/03/14	198	
	义州	1911/01/13	1911/03/02	173	兴京府	1911/01/20		8	
	宁远州	1911/02/12	1911/03/11	79	法库厅	1911/01/18	1911/03/03	403	

注：本表根据当时有关资料整理而成，因版面原因，许多无疫府州县厅没有列入。

依据《晚清东北三省疫势一览表》可知，此次鼠疫在东北三省的流行及疫毙人数情况。黑龙江省鼠疫始于1910年10月25日的满洲里，解除疫情时间是在1911年3月27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吉林省鼠疫始于1910年11月8日（宣统二年十月初七日），1911年4月2日（宣统三年三月初四日）为最后记载。在辽宁省（当时称奉天省），最早发现疫情是在1911年1月2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二日），止于1911年4月18日（宣统

三年三月二十日), 总计此次鼠疫流行近半年之久。^①

2. 关于疫源地及疫源物的争议

关于此次鼠疫源发地到底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俄境的问题, 曾引发过争论: 其一, 此次东北流行鼠疫的疫源地在俄国境内。清政府当时的文件即认为, 此次鼠疫“实由俄境后贝加尔州之大乌拉地方传入”, “据胪宾府知府实地考察, 确有证据”^②, 但俄国方面不承认此说, 认为: “此次之疫实由满洲里以南各地新发生后波及各处, 并非由满洲里直接蔓延。”^③ 此说在于否认俄境为疫源地、俄控东清铁路为传播疫源之导线。但德国医生波里则认为: “其病源则从北蒙古之高原地而来。”^④ 站在公允的立场上主张此次鼠疫疫源地在俄国境内。还是在东北鼠疫流行期间, 俄国医学博士查伯罗特尼“在后贝加尔铁路距伯尔加站约三俄里地, (力) 见有染病旱獭一头蹒跚于田间, 博士遂命随去医学生伊沙也夫奔去捉获, 移时已毙, 博士遂解而验之, 旱獭之血内隐有棒形毒菌, 确系染鼠疫而毙者”。^⑤ 此材料证明在后贝加尔地区确实存在鼠疫病源, 而疫源物即为旱獭。科学研究资料显示, 前苏联在被称为“外贝加尔疫源地”一带, 共分离到 129 株鼠疫菌, 其中蒙古旱獭就占 60%, 说明旱獭确实能够传染鼠疫。^⑥

其二, 在此次鼠疫流行期间老鼠及其他动物、牲畜等都没有成为疫源物, 说明惟有旱獭成为此次东北鼠疫的原发疫源物。在传统医学理论中, 普遍认为鼠疫由老鼠传播, 所以在当时的几乎所有防疫规章中, 都有除灭

① 关于此次东北的发病时间问题, 似无争议。1910 年 10 月 25 日(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最早在满洲里发现鼠疫死亡病例, 是为晚清东北鼠疫灾难的起始: “满洲里之疫自九月二十三日起至十一月十三日止, 共毙五百二十二人。”[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 第一编第一章, 第 6 页]之后其他地区皆由满洲里传入, 即可知其发病时间的确切。其终止日为 1911 年 4 月 18 日。另统计《盛京时报》“新疫日报”可知, 奉天从 4 月 1 日起至 4 月 11 日止已连续 11 天无死亡记载; 从 4 月 16 日至 4 月 26 日止又连续 11 天无死亡记录。(参阅《盛京时报》1911 年 2~4 月“新疫日报”。)据此可以认定 1911 年 4 月 18 日为此次东北三省终疫日; 另查《申报》、《大公报》在其后的时日里亦无死疫报道, 故 4 月 18 日也可认为是此次东北鼠疫的终疫日。

②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 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 第一编第一章, 第 6 页。

③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 第一编第一章, 第 3 页; 另据《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七日报载: “东清铁路总医士查明, 该疫之起源初在斯列勤斯克及黑河一带, 旋又传至阿穆尔及尼阔里斯克。十月初间, 由尼阔里斯克开至玻璃之轮船, 其中搭客不免有患病者, 是以玻璃始有此症, 渐达于海参崴。现在极力设法预防, 使瘟疫不得入满洲境内。”

④ 波里:《满洲鼠疫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 年)二月二十日。

⑤ 《研究旱獭瘟》,《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 年)六月十二日。

⑥ 方喜业主编:《中国鼠疫自然疫源地》,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109 页。

老鼠这一项。东三省在防疫过程中为达到除灭老鼠的目的，特制定了物质奖励政策，规定每捉一头“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①。仅奉天城内即捕获老鼠 25374 头。但经过解剖所有在东三省范围内捕捉到的老鼠，没有发现一例带有鼠疫菌的。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博士称自己在奉天（今沈阳）解剖老鼠三万头，解剖后无一例含有百斯笃（鼠疫）病菌，所以“由此可得今日三省所流行之百斯笃疫，非由鼠族传播之证据”^②。说明此次鼠疫传播的媒介不是老鼠和跳蚤，更不是“家畜”。中国医生伍连德说，在哈尔滨，猪、马、骡等动物死于肺百斯笃者有四五百头之多；英国也发现在新民府曾有一人感染鼠疫，他乘坐的骡马也感染鼠疫而死。说明动物也无抵抗力，只不过不如人之易传染而已。^③另，景冠华认为：“当流行期中，马、驴、猪也因肺鼠疫而死亡数百只。”^④说明此次鼠疫的直接疫源物是旱獭，尽管牲畜及其他动物也能被传染，但却不是直接的疫源物。

其三，人类感染鼠疫，与捕捉并食用有疫旱獭肉有关。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并烹食獭肉，使人类感染鼠疫：“俄人见满洲里旱獭之多也，私募华工四处捕取练（炼）制以充豹皮，利甚厚。……嗣胪滨府某守艳而贪之，增章程广号召，于是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⑤而鼠疫传染与人正是由于猎人烹食染疫旱獭肉所致。^⑥虽然当时俄国方面不承认晚清东北鼠疫是由俄境传入，但是没有一条材料支持其观点。

今天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判断，笔者认为此次东北鼠疫实由俄境西伯利亚地方传入满洲里，再由满洲里传入东北其他地方。在后贝加尔地区有一种叫旱獭的动物，就是引发此次东北鼠疫的疫源物，尔后贝加尔地区也就成了疫源地。即引发此次大鼠疫灾难的疫源地是在俄国境内，疫源物为旱獭，猎人烹食染疫旱獭肉，使鼠疫传播与人。

①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二编第六章，第 6 页。

②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二编第二章，第 37 页。另，也有材料说明，奉天省城防疫事务所曾发现 1911 年 4 月 12 日由第 440 号王玉清送来的毙鼠中发现有疑似鼠疫病菌；另，防疫队在清除广宁东区八里堡王姓疫毙户疫源时，发现有死鼠数头，未及剖验便消毒埋葬，故无法确认，但很可能“此为奉省鼠染百斯脱之祸首”。

③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 年）三月初十日。

④ 景冠华：《东北的地方性鼠疫》，《东北微生物学杂志》第 1 卷第 1 期，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一月，第 50 页。

⑤ 《东省獭疫种种之来因》，《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 年）二月二十五日。

⑥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三编第三章，第 17 页。

3. 关于鼠疫传入中国以及迅速蔓延的问题

满洲里发疫时间为1910年10月25日；哈尔滨发疫时间为1910年11月19日；长春发疫时间为1911年1月3日；奉天（沈阳）发疫时间为1911年1月2日。从始疫时间上可以看出，呈现出明显的传播序列，而上述地点又成为新的疫源地。此外，沿铁路线由北向南扩散的时间序列，也是此次鼠疫流行的一大特点。并由此以铁路为传播媒介，蔓延于东北重要区域。

此次鼠疫疫源地在俄国境内，鼠疫之传入中国并且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东北全境，因素固然很多，但主要因素有三：

其一，鼠疫由俄境传入中国境内，则实为俄人驱逐已经染疫之中国劳工所致。据当时知情者称：“满洲鼠疫确源于捕旱獭者，该患者于潜伏期间必与达乌利亚华工棚内之人相接触，故九月中旬忽有七人之暴死。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①又据当时牐滨府报告称：有华人在俄界大乌拉站务工，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初工棚内有七人暴毙，俄人知其为疫遂驱逐华人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其中有二人于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9日）由乌拉站来满洲里寓居，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染疫身亡，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②景冠华认为，“在满洲里的北方和贝加尔湖以南盛产旱獭（Tarbagan），鼠疫常流行于旱獭中，猎此兽者可染腺鼠疫，在1911年8月满洲里北贝加尔湖方面先发生腺鼠疫，旧历9月下旬由俄境来满洲里的劳工数名发病死亡，于是传播开来，10月初旬哈尔滨发生腺鼠疫，12月中旬每日死亡者竟达百六七十人，由哈再向南广播。”^③当时为满洲里税关医官的德国医生也主张是由于俄国方面驱赶华工才导致鼠疫沿铁路线蔓延的观点，指出：“此次满洲各地发生之鼠疫，必谓其始于满洲里虽不可知要，实由满洲里而蔓延至各处，可断言者。俄医所言殊未确切云云。故考其疫势，由满洲里起点即沿东清铁道一传至呼伦厅，再传达至龙江府，三传而趋重于哈尔滨。综计黑省染疫各属共十有六，要皆偏在省界南部，罔非直接间接受哈尔滨之蔓延。”^④批驳了俄方人员

① 侯毓汶：《疫之源》，《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三编第二章“百斯笃学说”，第9页。

②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一编第一章，第6页。

③ 景冠华：《东北的地方性鼠疫》，《东北微生物学杂志》第1卷第1期，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一月，第50页。

④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一编第一章，第4~5页。

的无理辩护,明确指出了此次鼠疫的蔓延是由于被逐染疫华工返国所致。

其二,当时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和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出于自己的私利,没能及时阻断交通,这也是鼠疫迅速传播并沿铁路线蔓延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东北为日俄势力范围,殖民主义者横行,所以使鼠疫的防控环境异常复杂。这点在当时东北地方当局发给军机处的电报奏章中即有反映:“此次疫症因东清南满火车往来蔓延甚速。”^①俄国出于本国的私利考虑并没有及时配合清政府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源流向中国,是造成鼠疫在东北流行的直接原因。德报记者波里博士认为:“又有一大原因,则昨年十月二十六日(阳历)支那人之患百斯笃者数人私自逃亡,俄国官员放任而不顾。又十一月初八日有二名之重病患者由哈尔滨站下车,俄国官吏亦未加检验,任其容纳于支那人家屋内。……倘使哈尔滨能早日设扑灭,当不至蔓延南满一带若是之甚也。”^②1911年11月中旬,是哈尔滨鼠疫流行最盛之时,然而此时俄控“东清火车”仍照常行驶,遂使鼠疫迅速传入长春。“长春居吉垣之西,为三省发疫之第二中心点。蔓延之祸不独吉省,西部承其独也。即奉天全省疫祸之糜烂,亦罔不以长春为传播地。故满洲里之毒至哈埠而四发,哈埠之毒又至长春而滋蔓。首受其祸者吉省西部各州县也。”^③并由此传达入辽宁,并进而蔓延于河北、山东等省。

其三,鼠疫迅速蔓延还与中国传统民俗习惯及落后的生活方式有关。关于此次东北鼠疫流行与旧有习俗的关系,《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绪言”中有一段论述最为准确:“此次疫事起……衡情而论,无论发生于大乌拉发生于满洲里,以俄国后贝加尔州固里雅克通古斯鄂伦春等部人民之习惯与我黑龙江西北部满蒙人之习俗衡之,均足为酿彼之媒介。”^④西方学者也认为:“病毒之发生地,本起于中俄交界之满洲里境内。该病所以如斯蔓延迅速之原因,则人民之暗愚与迷信实职其由。”^⑤这里所说的“习惯”、“暗愚与迷信”主要指东北各民族的生活方式,还有就是吃野生动物等习惯。此次鼠疫的引发就是因为当时的猎人吃了有鼠疫病源的旱獭肉所致。同时某些旧有的社会风俗习惯不仅无益于鼠疫的防控反而加速了鼠疫的传播和蔓延,如迷信鬼神、不信西医,停棺不葬,或不遵守隔离制度、强行为疫毙亲人送葬等等。

① 《奏报发疫情形并请拨大连关税电》,《东三省疫事报告书》“奏章”,第1页。

② 波里:《满洲鼠疫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日。

③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一编第二章,第47页。

④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绪言”,第3~4页。

⑤ 波里:《满洲鼠疫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日。

在封建时代,由于科学不发达及教育程度低下,中国百姓普遍迷信鬼神,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对于突如其来的瘟疫,普遍缺乏科学的防疫知识。迷信鬼神的结果,“有求仙方医治者,有持斋祷祀坐以待愈者”,勿需求医勿需隔离。其结果不仅不能免此灾祸,反而造成了更大范围的流行。

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状况往往与这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相适应,也是一个民族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的外在体现。在传统社会,下层人民生活条件所限,衣食不讲,住处简陋,是普遍现象。在晚清时代的东北,人民居住的房屋多低矮窄小,内设火坑占屋内大半,每坑睡三四人,多者睡五六人。生活、起居饮食皆在屋中。冬季为避寒冷,窗户用纸密糊。这种情况,空气不流通,卫生亦难保障。而中国人“之内室常多人杂居亦使此病毒得以蔓延之原因”^①。因此鼠疫流行期间,全家毙命者不在少数。在饮食方面,由于生活贫困,“无论腐鱼败肉及病死之獭肉遂以传疫其一例也”^②。中国百姓“昧于卫生之常识,于饮食未暇加意,故病菌得因以为缘职之故耳”^③。还有人对中国传统生活中的某些陋习十分忧虑:“乃起视吾民房屋之污秽如故,饮食之疏忽如故,一若行所无事者,既不知个人卫生之道,则所谓公众卫生者,更无论已。”^④

中国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殡葬风俗亦不利于鼠疫的防控。我国对于死者的丧葬之礼,向来隆重。“子孙之对于尊长,尊长之对于子弟,病则日夜调护,死则围守哭泣,葬则仪文烦缛。由病至死由死至葬,有至数年如一日者。”^⑤“丧葬之礼,皆视为大事,但以家境不同,遂视贫富以为厚薄。自父母疾革时,子孙为易新衣舁置床上,环立守之俟。”^⑥“当疾革时设床于室,子孙环视,净面盥手足。……至三日内尸于棺”,“安葬日大约在三七五七之间。”^⑦

“人死次日盛殓,三日送行,戚友咸至。……有停柩七日或三七五七百日始葬者。亦有久厝俟卜窆窆者,盖惑于风水也。”^⑧据《榆树文史资料》载:“宣统二年(1910年)腊月末,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郭老十,在大岭街开‘魁升元’旅店,有两名哈尔滨来的客商死于店内。紧接着—

① 波里:《满洲鼠疫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日。

②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一编第四章,第2~33页。

③ 汪翔:《满洲鼠疫谈》,《盛京时报》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十四日。

④ 梦幻:《对于天津防疫之感言》,《大公报》庚戌十二月十九日第一张“言论”。

⑤ 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绪言”,第7页。

⑥ 《开原县志》卷八·礼俗。

⑦ 《铁岭县志》卷十二·礼俗。

⑧ 《昌图县志》(二)第十四编·志礼俗。